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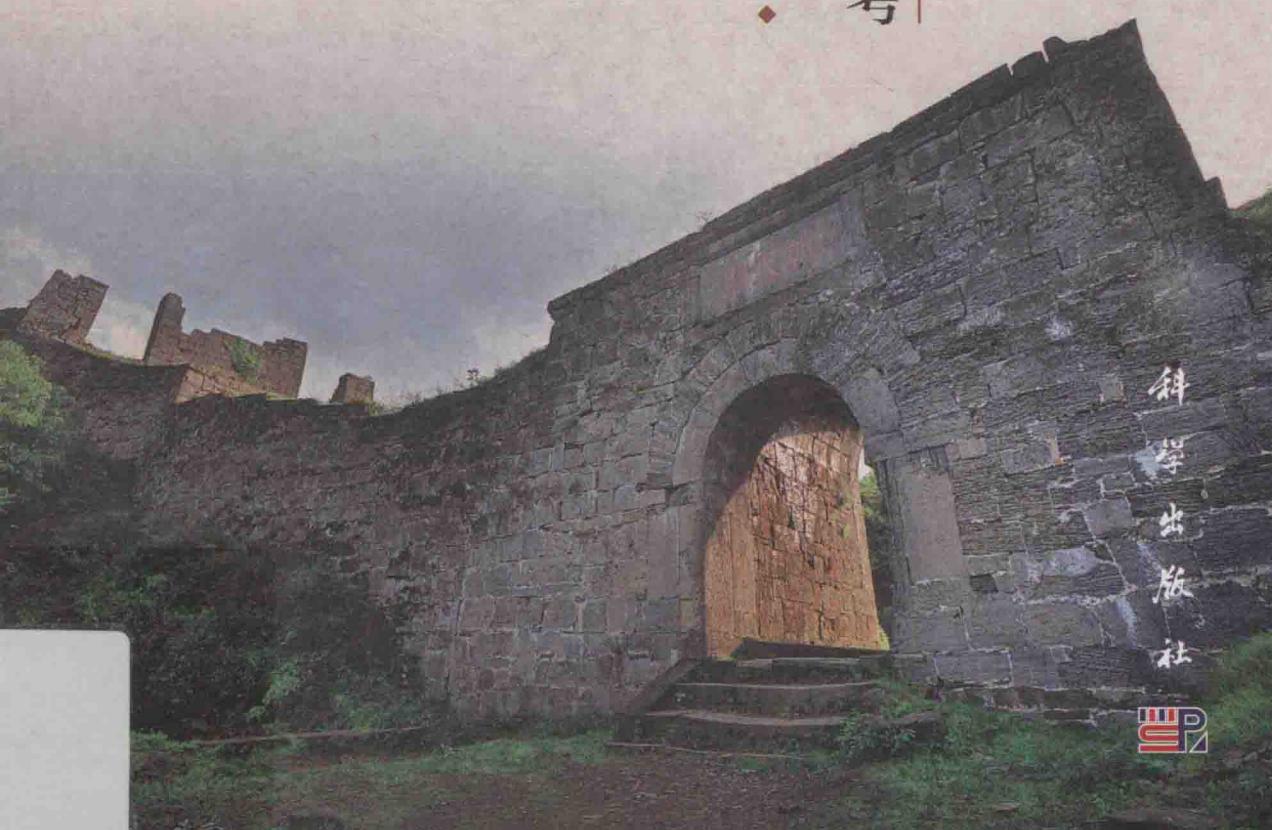
土司， 考古与公众



海龙囤公众考古的实践与思考

•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公众考古系列丛书



科学出版社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众考古系列丛书

土司，考古与公众 海龙囤公众考古的实践与思考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本书是“海龙囤与都匀石板城考古工作规划
2013—2015”系列成果之一。其出版得到国家文
化部资助。

策划·编辑·设计·排版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执行主编·陈明月

责任编辑·王春雷

副主编·吴永波

设计·李晓东

校对·王春雷

印制·贵州人民出版社

开本·880×1230

印张·10.5

字数·200千字

元·100.00

贵州人民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司，考古与公众：海龙囤公众考古的实践与思考 /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3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众考古系列丛书)

ISBN 978-7-03-039913-7

I . ①土… II . ①贵… III . ①土司－城堡－文化遗址－研究－遵义市 IV . ①K878.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39984号

责任编辑：柴丽丽 / 责任校对：鲁 素

责任印制：赵德静 / 书籍设计：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制版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年3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6 1/2

字数：385 000

定价：1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是“海龙囤与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规划
(2013~2015)”系列成果之一，其出版得到国家文
物局资助**

编辑委员会

顾 问：许 明

主 任：王红光

副 主 任：周必素

编 委：（按姓名笔画排序）

王红光 李 飞 吴璐珊 宋先世

张 元 张合荣 周必素 赵小帆

曹 波 董 欣

主 编：周必素

副主编：张 元 曹 波

执行主编：李 飞

编 务：吴小华 赵小帆



序

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文化遗产的主人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这是明代刘伯温对云贵地区的赞誉。许多初到贵州的人对贵州的第一印象就是感觉贵州是一个青山绿水的地方，但文化沉淀和底蕴似乎并不突出。其实不然，早在数十万年前，贵州这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上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留下黔西观音洞、普定穿洞、桐梓马鞍山、盘县大洞、安龙观音洞等。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曾把贵州普定穿洞誉为“亚洲文明的灯塔”。贵州北连川渝、南接广西、西毗云南、东临潇湘，自古以来就是一条文化通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代百濮、百越、氐羌、南蛮等几大族系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和睦相处。多种族群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呈现出“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文化生态景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彩贵州。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公众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和兴趣也在不断地提升。在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经济大发展，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下，如何保护和利用好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让其发挥出文化遗产本身所具有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教育价值？如何让更多普通大众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中来？这是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中所面临的问题，值得深思。

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它应该而且必须是全民的事业，社会各界都应该积极地参与进来。同时，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也要为全民所共享，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文化遗产的主人。考古工作也不应该只是考古人的专利，更不应该局限于单纯的考古调查、发掘、整理和研究。除了学术目的，考古工作还是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古成果也理所当然要为更多的公众所分享。依托海龙囤的考古发掘，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开展的“亲历考古，触摸四百年前土司生活”系列公众考古活动，在这方面无疑开了个好头。

位于遵义市高坪镇境内的海龙囤是关、堡结合的土司山城。它充分利用地形，又融入地形，是山地军事攻防建筑的杰出典范。它的周边风景旖旎，充分反映了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完美交融。海龙囤的建筑样式及其所蕴含的防御理念，对同期以及后代的同类工事产生了深远影响。托天所赐，它至今完整而真实地保存着明末废弃以来的格局。并于1982年列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深思熟虑，2012年3月，贵州省文物局启动了海龙囤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并于当年11月成功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同时为了切实推进申遗工作，我们适时开展了海龙囤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科学发掘。这项工作先后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及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反映出海龙囤的重要价值得到了普遍认同。

海龙囤系列公众考古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我有幸参与了其中的部分活动，对此多有感触。虽然眼下学界对“公众考古学”的学理探讨尚存各种争议，但却丝毫不影响各类实践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在我看来，公众考古学就是调动从民间到政府的各种力量，积极投身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来的一项互动工程。称其为“工程”，在于其“务实”的意义大于“务虚”的意义。作为文化遗产的管理者，我当然乐见其成，并有投身其中的冲动。这也是我欣然接受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邀请，积极参加他们组织的公众考古系列活动的原因。

应该说，海龙囤的公众考古系列活动很好地诠释了考古所同仁对“公众考古学”的理解，这是他们先“务虚”再“务实”的结果。而最后，他们又从实践活动中有了更深的思考，又从“务实”走向“务虚”。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总是这样周而复始转化的。在系列活动中，志愿者、艺术家、当地大中小学生等作为“公众”有了考古的“初体验”，并对海龙囤有了更深的认知；当地政府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当地百姓

的愿望也得到部分满足，行业的最高行政首长来了，各路专家也纷纷前来，海龙囤变成了一个交流与互动的大舞台。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甚至有了许多意外的收获。

进行公众考古的尝试，对贵州而言，这并非第一次。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8年出版的《赫章可乐——二〇〇〇年发掘报告》在枯燥的考古报告中开设了一些小窗口（“发掘者说”），以科普的方式对报告内容进行通俗的介绍，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并成为年度重要的公众考古事件。此后，由我倡议对贵州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梳理，面向公众推出“贵州文化遗产丛书”。经过数年的酝酿和准备，目前该丛书的第一辑“考古贵州”即将和公众见面。这无疑也是公众考古的一次尝试。

在此基础之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此次依托海龙囤而开展的系列活动，是贵州考古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内容最丰的一次公众考古实践，取得的成果也是多方面的。希望考古所同仁能认真总结和思考，再接再厉，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向那些一直热心考古、关注考古、渴望走近考古的公众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与考古人一道置身于山野丛林里的历史遗迹中，去体验这种与城市生活有别的情趣和浪漫，去感受贵州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上深沉而厚重的历史沉淀，让他们共享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文化遗产的主人。

是为序。

王红光

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

目 录

导言	1
上编 遗产与公众	7
第一章 风雨海龙囤	8
第二章 活动策划	19
第一节 策划方案	19
第二节 志愿者招募	24
中编 交流与互动	31
第三章 与公众的交流与互动	32
第一节 作为公众的志愿者	32
第二节 作为公众的当地村民	69
第三节 作为公众的大中小学生	81
第四节 作为公众的艺术家	113
第五节 作为公众的考古学家	120



第四章 与行政部门的互动	141
第一节 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	141
第二节 地方政府的积极协调	144
第五章 通过媒体与公众的互动	149
第一节 媒体报道：非专业人士的普及性传播	149
第二节 考古手记：专业人士的提高性传播	183
第三节 社会反响	201
下编 经验与思考	209
第六章 公众考古之我见	210
第一节 调查问卷分析	210
第二节 公众考古之我见	225
结语	243
大事记	245
编后记	253

导言

这本书是基于土司城堡海龙囤遗址一系列公众考古实践的全记录，之所以取名《土司，考古与公众》，是希望通过公众考古的实践，在土司遗产与现代公众之间建构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一

中国考古学的科普工作起步较早，后曾以“考古学的大众化”示人，但现在流行的“公众考古学”却是一个舶来品，内涵也较前者丰富。

20世纪70年代，由西方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考古学家社会责任的思考所引发的讨论，最终产生了考古学一个新的分支——“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它将焦点聚集在“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过去”，“过去对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等责任感问题上，因而超越了对“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学理探讨而上升到对“过去为何发生某事及其对于当下的意义”的阐释的哲学层面，以及具体践行活动中。其目的是通过参与式的实践，调和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与利益，从而助益文化遗产的保护。

问题在于，谁是“公众”？他们又如何能为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力量？英文的“public”一词，是一个与私人领域对立的公民集合体，译作中文，有“公共”（国家及其公共机构）和“公众”（彼此间有争论并消费文化产品的大众群体）两层含义。相应的，“public archaeology”也存在“公众考古”和“公共考古”两译。虽然强调的对象各有偏重，但都涉及了民众、考古学家和行政部门这三个主体。公众考古的实践，实际上就是三方围绕着考古资源的最优配置展开的一系列博弈活动。考古学家通过推动行政部门的制度供给，达到建立和完善考古资源保护和管理的相关法规的目的；通过与民众的合作，

使其利益在考古活动中得到体现，从而实现其了解自身过去的公共权利^[1]。

关系错综复杂，但对考古者而言，公众“这一名词只是方便用来指代一个多元的、但又不以考古研究为职业的人群。在我们的语境中，‘公众’只是因非专业考古学者这一特征而集合成的一个概念”^[2]。具体到某一个遗址中，我们认为除了在此开展工作的考古者以外的所有群体，包括外来的考古学家均可称之为“公众”。进而言之，在具体考古活动中，凡发掘团队与其自身以外的所有“公众”的互动，均属公众考古的范畴。此时，开展考古活动的遗产地就变成了“交流”与“解释”的一个重要场域，来自远古的信息在此破解，在此扩散，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得到适当满足。被视作公众考古学核心思想的“交流”、“解释”与“考古学利益相关者”^[3]均在此场域中得以呈现。相对于博物馆、陈列室等传统展示渠道，考古现场则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二

2012年5月起，土司城堡海龙囤遗址的考古现场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域。关于海龙囤，第一章有详细交代。借配合“申遗”而对海龙囤展开大规模考古发掘之机，经过周密的筹划，我们在海龙囤考古现场开展了一系列公众考古的实践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详见第二章）。作为遵义重要旅游目的地的海龙囤，因为与土司政治及其生活的密切关系，对包括考古学家在内的公众都充满诱惑，这是相关活动能顺利开展、各方利益得以体现的重要前提。加之此次考古工作是在“申遗”背景下开展的，地方政府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积极投入到考古活动中来。汇川区人民政府通过专题会议、现场办公、文件等方式，极力推进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开展，行政部门和考古者的利益均得到充分体现。国家文物局领导数次登囤指导工作，用实际行动积极推动了海龙囤的发掘和申遗工作（详见第三、四章）。而针对专业化和公众直接参与的不和谐，我们则通过讲座、媒体宣传、现场体验等方式，让公众了解自身过去的公共权利得到部分满足。

首先，在中国第七个“文化遗产日”之际，策划了“亲历考古，触摸四百年前土司生活”系列公众考古活动。于6月9日文化遗产日当天，邀请知名学者在贵州省图书馆举行主题为“聆听海龙囤”的大型学术讲座，并从听众中产生70余名幸运者，于次日与考古者一起登囤，在考古现场“触摸海龙囤”。此后又组织了黔籍知名画家进海龙囤的“画中海龙囤”活动，用他们手中的画笔描摹四百年前的土司生活；组织遗址所在地的高坪

^[1] 魏峭巍：《分歧与整合：公共考古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第43页。

^[2] [美]尼克·麦瑞曼著，周晖译，方辉校：《公众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第113、114页。

^[3] 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学》，《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第54页。



◆ 俯瞰新王宫（李哲 摄）

镇中小学生将课堂搬至考古现场的“爱我家乡，考古进课堂”活动；以及与遵义市政协共同组织了政协委员参观考察与文艺演出相结合的“走近考古，支持申遗”的活动。当考古工作接近尾声时，我们邀请了全国20余位知名的考古学家亲赴海龙囤，并召开现场座谈会，请他们为海龙囤的发掘、研究与保护出谋划策，此举在“交流”中实现了海龙囤价值于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如果说“聆听”只是一个引子，其后开展的“触摸”则是活动的重点。包括外来考古学家在内的“公众”通过现场的观摩与体验，对海龙囤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相关感受又通过他们传达给更广的“公众”。这部分内容反映在第三章中。

但能到现场“亲历考古”者毕竟少数，如何进一步协调专业化发掘与公众参与的不和谐？无疑，通过媒体与公众形成互动是最佳的选择。因此，在“亲历考古”活动之外，我们与媒体展开了密切的合作。从2012年5月开始，中央电视台、贵州电视台、遵义电视台、新华社贵州分社、中国新闻社贵州分社、《贵州日报》、《贵州都市报》、《贵阳晚报》、《遵义晚报》、《中国文物报》等媒体对海龙囤考古发掘进行了密集的报道，几

乎每周均有新闻推出。同时，由考古工作者撰写的“海龙囤考古手记”也在《贵州都市报》、《贵州日报》、《中国文物报》、《中国文化报》等媒体持续刊出，最新的发现与认识通过媒体及时传递到公众的面前，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甚至出现读者收集“考古手记”登囤请教的插曲。相关内容记录在第五章中。

而基于考古发现的专题学术讲座，实现了另一个渠道的传播与互动。第一期发掘过程中及发掘结束以后，我们在海龙囤、遵义、北京和贵阳举行了多场面对不同听众的学术演讲，广受好评。如2012年9月22日，应“遵义名城大讲堂”之邀，在遵义市图书馆举行《海龙囤：两千里疆土家与国》的专题学术讲演，数百名听众出席。2012年10月16日，在“娄山关·海龙囤国际山地户外运动挑战赛”举行期间，在海龙囤面向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香港、北京等地的约200名运动员、教练员讲述海龙囤故事。2013年1月9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颁奖仪式上发表《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2012年度发掘》的学术讲演。2013年4月11日、5月20日，海龙囤遗址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走进社区、走进校园，与社区居民和高校师生进行交流与互动（相关内容见本书第三章及“大事记”）。

所有“公众”中，当地村民无疑是与遗产地关系最为密切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利益如何在考古活动中得以体现？相当部分当地村民在考古工地做工，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完成了与海龙囤事实上的“亲密接触”。部分村民则长期在海龙囤从事牵马、导游、餐饮等旅游服务，考古工作开展后剧增的游客量也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这些都是考古活动所带来的直接成果。此外，发掘期间，针对当地村民的贫困状况，我们联合媒体通过微博发起“考古探秘+公益慈善”活动，使城市中人在进行海龙囤考古探秘精神之旅的同时，也能对当地贫困村民予以捐助。这一活动被新华社等媒体誉为“走出文化扶贫新路”，予以高度评价。更有当地村民写诗传扬此举，称“杨雀记得千年树，乞丐记得贤惠人”。相关内容记录在本书第五章中。我们相信，当地政府会充分考虑村民的利益诉求，未来海龙囤“申遗”一旦成功，他们的生活条件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

三

基于海龙囤的公众考古实践，在面对面或通过媒体与大众的互动中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尽可能协调了各方利益，对文化遗产保护有着正面、积极的意义；同时强化了考古学存在的价值，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效应。

毋庸讳言，我们的实践也存在一些不足，譬如对慕名而来的大批游客未能有效疏导，使其有“亲历考古”的现场体验。再如对公众考古活动开启“民智”后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的考虑和安排不多。对于后者，我们曾有过惨痛的教训。通过广泛的互动，不法者一旦



◆ 围内的村庄——城门洞

认识到遗产的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便可能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而对其采取恶意的破坏，这就要求我们在“打开天窗”前必须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以免悲剧的发生。相关讨论详见第六章。

任何事物均有其两面性，公众考古亦不例外。好在海龙囤历时多年的考古发掘活动才刚刚开启，我们的公共考古实践也才刚刚起步，尚有时间对不足之处予以改进。



上编

遗产与公众

四百年前，这是一处土司的禁地。

四百年后，这是一片大众的乐园。

土司神秘的生活穿越时空招引着今人流连的目光

在考古人的引领下，一切触手可及。

